

〔法〕谢和耐 著
刘 东 译

蒙元 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谢和耐先生乃一代汉学宗师，来自对整个世界史学界影响至深的年鉴学派故乡。他在本书中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南宋临安的日常生活场景，向读者勾勒出了一卷立体的《清明上河图》，从而为中华文明重现了昔日鼎盛时的荣光；但同时，他又把直至宋代才臻于化境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颓命，置于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背景之下，故足以给希望检省这种文化之负面后果的读者以深刻的启发。

〔法〕谢和耐 著

刘 东 译

本书责任编辑：陈来

蒙元

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编 著 者 [法]谢和耐
译 者 刘东
责任编辑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页2
印 数 1—4000册
字 数 157千字
版 次 199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359—2/G·339
定 价 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借鉴与创造。为此,我社在优先出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关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著作的同时,也适当选择一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出版。海外学者占有的丰富资料,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某些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评估中国文化的传统、心态及其前景,从而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的建设,都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当然,他们的著作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甚至同我们存

2579/119

在着某些原则分歧,这是需要读者加以认真审察和辨识的。同时,任何借鉴都代替不了自己的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靠我们自己从中国当代的实践中去概括和总结。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只求为此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和比较。如果这套丛书能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将感到欣慰。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

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城市 8

1. 选都杭州 8
 2. 人口过剩及房荒 12
 3. 火灾及消防 17
 4. 交通与供应 21
 5. 城市生活的乐趣 29
-

第二章 社会 36

1. 变迁中的社会 36
 2. 上流社会 38
 3. 商人 51
 4. 城区的普通百姓 64
 5. 农民 73
-

第三章 衣·食·住 80

1. 居住 80
2. 个人卫生 88

3. 衣着 92

4. 饮食 97

第四章 生命周期 104

1. 家庭环境 104

2. 出生 107

3. 抚养与教育 111

4. 婚姻及妇女之地位 116

5. 疾病 125

6. 亡故 130

第五章 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 133

1. 节令与历算 133

2. 节庆 138

3. 宗教 149

第六章 消闲时光 165

1. 城市生活的影响 165

2. 娱乐 168

3. 艺术和文学 172

第七章 总结性描绘 186

译后絮语 192

人们惯常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实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任何未被分辨清晰的事物,总是显得缺乏特点。如果我们自家的文明也遭到历史学家们此等程度的忽视,如果人们对它自古代以降的复杂发展也所知甚少,就像他们对中国的那样,那么,它同样也有显出巨大惯性的危险,在其某些传统和精神取向中也同样能找到中国那种恒久不变的特质。不过我想,在这方面的错觉也包含着某种真理的尺度,至少它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自家的文明和中华文明一样,在其抉择关口都是奇异的和飘忽不定的。只是由于缺乏适度的比较,才使人们难于领略其妙处所在,尽管这尚未妨碍我们每每进行自我省察。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经历过诸阶段之发展的并不只有我们的文明。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曾经建立起来的有关中国的固有形象正在消逝。而一旦笼罩住其轮廓的迷雾散去,我们就将发现,中国的历史并非存在于延续性和不变性之中,而是存在于接踵而至的一连串剧烈震荡、动乱和毁坏之中。从公元6世纪到公元10世纪,中国经历了一个其面目全然无从辨别的时期。当时,草原的游牧民族盘踞了北方各省,而佛教的全面胜利也留下了至深的印迹。事实上,每个时期都自有它独具的风貌,甚至唯独适于它的环境。此外,

中国的幅员辽阔,也意味着它在气候、风光、生活方式、习俗和方言等方面千差万别。这是一个面积可与整个欧洲相匹、具备近 3000 年有记载历史的国度,因此,任何对它的有效论述都必须涉及确切的时间与地点。再不许奢谈什么“永恒不变的”中国了。

14 笔者最初本欲写一本涉猎面更宽的书。但鉴于中国的世界是如此巨大,各地区有所差异,历史赓续不绝,我发现有必要对研究领域进行更精确的限定。我所选定来描绘中国生活的特定历史时期,是被称之为南宋的那个王朝的末年(1227—1279),即其国都从 1276 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我所选定的区域则为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作临安,是中国建都之处。如今,此处为一片旅游胜地,以其山明水秀闻名遐迩,它是一座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市,位于上海西南 120 英里处的钱塘江口。在 1275 年前后,它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为富庶的大都会。

在说明我们作这种选择的理由之前,有必要作一番历史简介。

在公元 8 世纪的唐朝,中国有过最辉煌的岁月,而到了公元 12—13 世纪,情势就有了令人瞩目的扭转。在这 4 世纪中,发生过急剧的变化。一个尚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所取代了。

整个该时期的共通特点在于农民的贫困和不安定的生活,这完全可以一目了然,而且,这种贫困还在与日俱增。中国唐代的粗犷朴素的伟大可以归咎于其气候的特点和人民的性格。它立国的中心在干燥和充满灰土的黄河河谷平原,该平原展开于河西走廊的末端,而河西走廊则穿过了大片高山峡谷,直抵中亚腹地的军事要塞。在马可波罗看来,中国 13 世纪的蛮夷之地反而是稻田密布、运河成网的江淮流域和浙江丘陵地带,以及东南沿海省份(现在的
15 江苏、浙江、福建)和长江流域。对于这位威尼斯旅行家来说,这里和中国北部反差很大,简直判若天壤。

公元 8 世纪的中国南方,由于其沉闷并使人丧失活力的气候,只不过是辽阔帝国的一块未开拓的地区罢了。人们的兴趣和感情都另有所系。对于许多人来讲,南方并非祖先的故土,在那里会产生一种流放之感。中国的伟大王朝总是建都于北方,即如今的西安及其以东地区。

不过,数世纪过去之后,人们已经不断地感受到了中国南方的日趋增长的重要性。在南方,人口更加密集,富足程度增加,海上和内河交通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一种几乎不为中国北方所熟悉的特殊的城市生活方式,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书香世家,这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它的活力。对于这种深远的、几乎难于觉察到的变化过程,我们最先想到的也是最有可能正确的解释是:正是公元 10 世纪至 13 世纪的来自中亚和今天蒙古一带的野蛮游牧民族的持续不断的压力,才构成了促进中国长江流域和东南省份经济普遍成长的主要动因。

游牧民族入侵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唐代,当时通往中亚的丝路被切断了。其第二个阶段,是胡人于长城以北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西夏、辽和金),并从 10 世纪末至 12 世纪初对中国的北部省份构成了持久的威胁。在最后一个阶段,则带来了种种悲剧性的事件,而发生这些事件的历史岁月又构成了我们对中国日常生活进行描写的背景。这段历史时期包括两个重要的年份:首先是 1126 年,北宋(960—1126)的京城(今河南开封)于当年失陷,紧接着长江以北的整个中国北方均被侵占,此后,中国皇帝和他的朝廷最终在杭州定居下来,而与此同时汉人与胡人的交锋前线也沿着江淮流域确定下来;其次是 1276 年,杭州遭蒙古人侵占,而整个中国也在其历史中首次全境陷落。对于中国人来说,看到中国完全屈从于反抗一切文化、坚执其好战的部落传统的蛮夷民族,乃是一番五内俱焚的经历。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游牧民族之令人惊讶的征服也使得大家瞠目结舌。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

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坏。

有没有理由说此一时期乃是纷扰的时期?如果有,那不啻在说: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日常生活亦有着直接的影响。只不过,大多数人并未被这一重大的历史灾变所动,除非有朝一日他们亲身卷入其中。毫无疑问,对于那些手执权柄、其爱国心又强到足以使他们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悠哉闲哉。如所周知,中国人很有一套处世的哲学。

必须认识到,上流社会几乎总是一无例外地不负责任和一晌贪欢。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并非没有指出——中国的失败和屈服要归罪于其统治者的道德沦丧。这再次提醒了一个旧有的经典主题:当皇帝和朝廷沉湎于享乐而不理朝政的时候,就会自寻死路。北宋的末代皇帝就是一位审美家,热衷于绘画和艺术品的收藏。而南宋的最后几位君主,则既缺乏“德行”,又缺乏现实感。但话说回来,国防尚能牢固地组织起来,而且国家亦将其岁入的大部分用来维持一支百余万的大军。所以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进一步的研究将会表明:中国崩溃的真正原因其实与道德松弛无关,而似乎更像是在其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本质之中。有关 13 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这座大厦已是十分脆弱,只要蛮族用力地推它一把,就会倒塌下来。

不过,尽管帝国已经相当虚弱,却仍十分可观。13 世纪的中国,即使其北方省份已被胡人占据,也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幅员,从四川省到长江下游平原,东西一线超逾 1200 英里,而从南部海岸到北方前线,南北一线超逾 600 英里。故其总面积达到了 70 万平方英里以上,也就是说,足有当今的 4 个法国那么大。它的

人口总数达到了 6000 万以上。* 这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数目，特别是当我们考虑了下述事实——有四分之三的地方乃是几乎杳无人迹的山区，而人们只是高密度地聚集在川西的成都盆地和长江下游平原（今江、浙两省）之后，就更会为之惊叹不已。长江的航运经由其支流，可以远抵成都周围的富饶平原地区，从而构成了中国南方的主要商业通道。帝国东部地区的运河网络连接着大城镇，河面上的船队昼夜不停地航行。一支庞大的沿海船队维持着东南沿海的贸易中心与南部沿海贸易中心（远达广州）的联系。而大型的海船则每年都在季风时节往来于中国和南洋群岛、印度、非洲东岸以及中东之间。在内陆，永久性的集市于南北陆路和长江的交汇点上发展起来了，其贸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商业中心。

13 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卷，其高度发达的茶叶和盐业企业，其对于外贸（丝制品和瓷器）的倚重，以及其各地区产品的专门化等等。无所不在的国家掌握了许多商业部类，并通过一种国家专卖权体制和间接税收而获得其主要岁入。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的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接下来，再让我们谈谈为什么要选择此时此地来加以描述。

在中国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断了此一迅速进步的过程。此一时期的显著标志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发展。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内，杭州居民的人口就翻了一番，迄 1275 年已逾百万。这种增长还并非京城特有的现象。由于直接关注城市生活，我们仅限于着重指出在那个时代最具典型性的特征。

* 根据官方的人口调查，中国的人口总数在 1060 年至 1110 年间似乎翻了一番，而到了蛮族入侵的前夜——1126 年，则达到了 1 亿。——作者原注

选择本书确定的时间与地点，还出于其他的一些考虑。不可否认，有关宋代的考古学上的材料既稀少又缺乏特殊的意义。12和13世纪生产的陶器相当重要，并且留下了数不清的标本，但除此之外，就只剩下很少一点东西了，比如妇女的饰物、玻璃杯、漆瓶漆盒、彩绘枕头以及铜币等等。由于中国建筑所用材料的轻脆，竟连一件建筑上的碑铭也没有留传下来。能够向我们提供日常生活细节的，主要来自绘画作品。宋代的画家们的确喜爱描绘富家生活的细致场景或街景。在其他的这类文物当中，我们可以参考一幅表现了12世纪初叶之开封城的长轴，此幅长轴出自一位特别擅长描画城墙和车马的画家。^{*}然而，很不幸的是，由于明代的画家特别偏爱收藏有关花卉、竹子和山水的画作，像这样具有生动写实风格的绘画作品留存有限，只剩下寥寥几幅原作（或更确切地说，是摹本）。

不过，考古材料的欠缺，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几乎可以说是丰富
19 已极的文字材料所弥补了。正是在宋代，可以从中抽取有关日常生活的文本开始增多了，如生活琐记、轶事汇编、笔记小说、地方志等，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和栩栩如生的细节。这类信息资源的骤然增多，其原因不外乎：从10世纪初叶以来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推广使用、教育的进展，以及与之相应的商人阶级的兴起，商人中间并不存在对于描绘琐碎细节的藐视，这一点与文吏大相径庭。至关重要的是，当时的史料在有关1275年前后的杭州城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多得令人惊讶的信息。这个城市的居民把涉及到它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留给了我们：它的街衢、运河、建筑、官衙，它的市场及商业交易，它的节庆和娱乐……简直到了这样的程度——如今竟可以事无巨细地将这座京城重现出来，找到人们做每一类买卖的精确地点，以及每一座寺庙的准确位置。我们甚至获知了当时

^{*} 此处当指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译注

最红的歌妓的姓名、主要街道上铺路石板的块数，以及各个最佳的去处：诸如在哪一座桥边，在哪一家店铺，可以寻觅到最好的蜜饼；又在哪一条街巷有最好的房子待售等等。

选择这个城市来描绘还有另一个有利之处：马可·波罗曾于那里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时值 1276 至 1292 年间，也就是从杭州落入蒙古人之手起，直至他启程返欧止。在这段时间内，杭州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马可·波罗的回忆录中，其最长和最详尽的部分之一便是他对于自己离别的中国京城的回忆。那也是其最生动的部分。如果从某种角度来衡量他这本书，它确实是基于一位蒙古将领的官方记载而写成的，后者自 1276 年年初起对杭州进行围攻。但即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他仍然同样经常利用了他个人的亲身感受。他的描述既有趣又朴实，其功绩不在中文文本所提供的记载之下。在他的描述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在准确细节方面与杭州居民的刻画不尽相符之处。长期以来，此书的所谓拉姆索 21 (Ramusio) 版本遭到了怀疑，可是它在描述杭州城的细节方面却比更常见的版本《马可·波罗游记》(The Book of Marco Polo) 丰富得多，而且，在将其与中文资料相印证以后，我们也发现它的细节在大多数场合也与后者贴合得多。我们最经常援引的正是这个版本。

附带补充一点：本书几乎全部是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写就，而在许多方面又补充了完全崭新的信息。可供征引的二手材料极其匮乏，这是因为除了极少数研究家之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迄今未吸引更多的作者。更何况，中文确乎是一种难于掌握的语言。也许，上述原因倒可以成为一个原谅本书种种阙失的理由哩！

22 第一章 城市

1. 选都杭州

时机往往会把事情安排妥贴。公元 1126 年，当马背上的蛮族女真人以雷霆之势攻占宋王朝的国都（即今日的开封，位于黄河流域）时，南迁便开始了。不过，当时并无任何迹象显示出杭州注定会成为新王朝的行在。它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边远省份的省会，坐落于浙江口，距离主要的商道相当遥远。二帝及其廷臣，一行 3000 余人，被蛮族押送到沈阳以远的地方。一个逃脱的皇侄于公元 1127 年在南京称帝，尔后便在游牧民族侵袭之前望风而逃：有时候逃到长江中游的城镇；有时候再向东逃到扬州，大运河在那里与淮河相接；或是逃到长江右岸的镇江，江水经南京流到这里；又再向南逃到苏州，接着是杭州。这些地方的城墙均不足以敌御侵略。但比起来，高宗多次停留过的杭州，却比长江流域的城池更易于防卫。若要抵达那里，须先经过一片布满无数湖泊和泥泞稻田的地区，这

23 使得骑兵难于展开。在开封失陷 10 年后，局势恢复平静，中国划淮河而分为两半，淮河以北为蛮族所据，以南则属于汉人，而皇帝终于选杭州作为都城。

宋高宗之所以作此决定，既不是出于杭州城的重要性，亦非出